

从文学文本的三种形态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Three Forms of Literary Text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吴 笛 (Wu Di) 顾发良 (Gu Faliang)

内容摘要: 本文认为聂珍钊的近作“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和理论建构”中关于文学文本的三种形态的阐述,遵从了语言文学发展的历史渊源和规律,丰富了文本理论,适应了科学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和系统阐释,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文本中的脑文本、书写文本、电子文本的阐释,不仅囊括了文学生成、成长和传播中真实发展的三个基本历程,而且也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确立了现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对电子文本的关注,使得文学批评有了可贵的科学精神,并以开放性的胸襟引发人们对文学功能的反思和重新审视,力求文学研究更加逼真地贴近文学的本质特性。

关键词: 文学文本;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

作者简介: 吴笛,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和文学翻译研究;顾发良,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文学基础理论跨学科研究”【项目批号:2020FZA111】阶段性成果。

Title: Three Forms of Literary Text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Nie Zhenzhao's recent work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laborating on the three forms of literary texts and following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rules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velopment, enriches literary text theory,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new century,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 The interpretation of brain text, written text and electronic text in literary texts not only encompasses the three basic cour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from its origination, growth and dissemination, but also establishes a realistic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Moreover, the attention to electronic texts gives literary criticism a valuable scientific spirit and provokes people to reflect

on and re-examine the functions of literature with an open mind, striving to make literary studies more realistic and close to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literary text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uthor: **Wu Di**, is Professor and Ph. D. supervisor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English poetry, Russian poet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hzwudi@yahoo.com); **Gu Faliang**, is a Ph. D. candidate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58 Hangzhou, China),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文学伦理学批评自从在中国的大地生成以来，一直以开放的胸襟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如今，它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也作为富有生命力的批评方法，被国内外学者所广泛接受。而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创始人的聂珍钊教授，更是以极大的热忱，在文学伦理学批评领域，不断开拓，引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发展。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的近作“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和理论建构”，既是十多年来文学伦理学批评现状的宏观总结，更是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又一丰碑。

—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和理论建构”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关于文学文本的三种形态的阐述，遵从了语言文学发展的历史渊源和规律，对传统的文本理论提出了挑战，适应了科学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揭示了伦理选择等批评术语的理论意义，而且，其理论和学术观点是基于文本理念的，赋予文学一种“感性具体”的理念，体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论特质。因此，就方法论而言，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基于文学文本的现实主义批评，而不是基于想象的浪漫主义批评。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和理论建构”中，聂珍钊教授系统总结了作为文学载体的三种文本形式，即“以大脑为载体的脑文本、以书写材料为载体的书写文本和以电子介质为载体的电子文本”（79）¹。我们追溯人类文学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脑文本、书写文本、电子文本这三种基本文本形态的总结，囊括了文学生成、发展和传播中的三个基本历程。既肯定了远古口头文学中人类童年时代的智慧和文学的生成，同时也阐释了从纸草到纸张的各种书写材料得以产生对文学所形成的影响，以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电子技术的发展，对文学新形态的理论介入。因此，关于文学文本的三种形态的理念，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1 本文中的引文凡是只标注页码的均引自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和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205-206。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脑文本、书写文本、电子文本，这三者具有缜密的逻辑关联，尽管三者概念不同，但是它们之间是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尽管都是文本，但是它们也不是互为关联，而是一种递进关系。只是有了脑文本，才会有书写文本；只是有了书写文本，才会有了对应的电子文本。尽管三者都是物质文本，但是，只有书写文本才是有形文本。然而，书写文本是以脑文本为前提的，没有脑文本就没有书写文本，书写文本可以凭借纸草、泥板、竹简、龟甲、牛骨、纸张等物质中介进行交流，而脑文本如果没有转化为流畅性物质文本就无法交流。同样，电子文本是以书写文本为前提的，没有书写文本就没有电子文本，电子文本可以通过打印机的打印而转换成书写文本，可见，电子文本是书写文本的一种新的流传形态，是文学书写文本在现代科技语境下的一种典型呈现。在三种文本形态的关系问题上，主要是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层面上发生关联，所以，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和理论建构”这篇重要文献中，聂珍钊教授格外强调脑文本的独特功能，认为：“文学文本需要通过脑文本才能发挥教诲功能。只有脑文本才能决定人如何进行伦理选择，才能决定人的思想、观念、情感和道德。脑文本为认识文学的教诲功能找到了新途径，但是有关文学脑文本的作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81）。

二

在三种文本形态中，脑文本的概念是聂珍钊教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所作出的重要的理论贡献。所谓脑文本，是指“以人的大脑为介质保存的记忆。脑文本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形态，是人的大脑以记忆形式保存的对事物的感知和认识”（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70）。作为大脑所保存的记忆，随着对事物的感知不断深化和演变，脑文本也是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脑文本越是完善，其记忆越是深刻，保存的质量越是高超。但无论如何完善和高超，它在没有进入交流和传播之前，只是归脑文本所有者个人所拥有，而且还会随着脑文本所有者的死亡而“死亡”。所以，只有进入流传领域的脑文本，才会超越“死亡”，化为共有文本。那么，怎样才能进入流传领域呢？靠的是声音转换。聂珍钊教授曾经中肯地指出：“将脑文本转换成声音，也是认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当人的感觉器官将接受到的事物传送到大脑中枢时，脑概念需要同根据经验得到的与脑概念相对应的声音对接，确认脑概念的声音表达。只有当脑概念同声音形式结合起来，才能通过发音器官表达”（“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121）。世界文学史发展的进程充分说明了脑文本只有通过声音转换才能流传的道理。

我们必须认识到，不是所有的记忆都可以成为脑文本，不是所有的脑文本都可以成为文学脑文本。可以说，文学层面的脑文本或文学脑文本是人类思维水准和语言交际能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得以产生。对于书写文本尚未

出现之前的文学文本，聂珍钊教授作了极为科学的“脑文本”的设定，这样，书写文本尚未出现之前的“口头文学”就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有了合适的身份和生存的空间。聂珍钊教授在文中认为：“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本观点，口头文学也是有文本的，这个文本就是存储在大脑中的脑文本。口头讲述的是这个脑文本，口耳相传的也是这个脑文本”（80）。而且，他从语言与文学相融汇的跨学科的视野，对于脑文本的生成，进行了语音学层面的分析：“人的发音器官的基本功能就是把脑文本转换成声音，生成语言，让听者能够理解。口头讲述是人的发音器官的发声活动，其本身不是文学，而是一种通过发音器官表达文本的方法。有了脑文本，发音器官才有讲述的内容，才能将脑文本转换成声音。口耳相传是听者利用听觉器官接受讲述者用发音器官表达的脑文本，然后将其复制成新的脑文本存储在自己的大脑里”（80）。这一观念对于我们探究各类文学类型的起源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纵观世界文学发展的历程，书写文本存在之前，脑文本是重要的文学文本。时至今日，文学已经发展到极其高超的阶段，如果我们将今天的文学比作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那么，这棵参天大树的根须则是远古的诗歌。而这一远古的根须最早的形态便是脑文本形态。正是从这以脑文本形态体现的根须中逐渐生出了戏剧、散文、小说等其他各种文学艺术类型。

而且，从诗歌生成渊源中，也可以理解脑文本的存在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所在。关于诗的起源，如同诗的定义一样，历来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尽管争议较大，但也有一些影响较大的观点。其中最为传统的一种说法是“摹仿说”。这一学说始于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德谟克利特认为诗歌起源于人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四章中写道：“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亚里士多德 24）。他接着还解释说，正是出于这种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作出了诗歌。朱光潜先生也以人类天性为基础，探讨诗歌的起源，认为诗歌、音乐、舞蹈原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其共同命脉是节奏。“后来三种艺术分化，每种均仍保存节奏，但于节奏之外，音乐尽量向‘和谐’方面发展，舞蹈尽量向姿态方面发展，诗歌尽量向文字方面发展，于是彼此距离遂日渐其远”（朱光潜 11）。可见，在诗歌渊源中，文学伦理学批评所强调的伦理诉求在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无论是劳动歌谣，还是赞美诗或讽刺诗，或是坚持“巫术说”的巫术诗，其生成的动因并非出于情感的表达，而更多的则是出自自身的伦理选择的诉求。而且，文学刚开始生成的时候，为什么首先出现的是诗歌呢？我们认为这与脑文本的流传密切相关，因为只有韵文才更容易流传，少出差错，可以用韵式为脑文本制定了一个价值尺度，后来，随着印刷术的产生和普及，韵式的作用得以淡化。正是因为有了文本流传的更为有效的物质形式，所以，韵式的作用得以消解，靠脑文本难以流传的长篇小说等艺术形式得以产生，

即使是诗歌文本，也不再强调韵式的作用，于是自由诗体也就随之自然产生。

三

文学作品有别于具有客观逻辑内容的历史文献或行政文件，不像历史文献或者行业指南那样直接提供有用的信息。文学文本常常无法提供直接作用于阅读者的有用的信息，而是一种需要在阅读过程中必须进行感受和思考的文本。正因为文学的这种特性，所以有关文学的概念五花八门，难以统一。这种现象，大多是缺乏“书写文本”的理念所造成的障碍。在过去相当长时间的文学批评中，占主导地位的审美批评主要基于审美者阅读和审美体现，而不是基于书写文本。于是，正如人们对于诗歌的定义一样，其定义也无法统一。别林斯基曾经谈到：尽管所有的人都谈论诗歌，可是，只要两个人碰到一起，互相解释他们对于“诗歌”这一字眼的理解，那是我们就知道，原来一个人把水叫做诗歌，另外一个人却把火称着诗歌（吴笛 7）。即使将诗歌看成是一种艺术形式，也难以对于诗歌作出令人信服的中肯的评价。所以，有西方当代学者戏称诗歌是每一行都写不到页边的艺术形式（Pickering 5）。

对于诗歌的内容的评判，也是如此，诗歌文本不同于历史文献等社会科学著作，在每一首诗的背后，都有一个诗人的存在，都有一个诗人情感世界的存在，都有独树一帜的诗歌个性和特殊诗歌风格的存在。

“书写文本”，是基于“脑文本”的存在，是书写符号的实物载体，是书写符号（文字媒介）和印刷术形成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当书写符号还是以记忆和声音为载体，并且以记忆的形式储存在大脑的时候，这一脑文本的传播效果是有限的，脑文本只有找到了实物载体，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书写文本”之后，才得以永久保存和准确地流传。所以，文字媒介和印刷术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有学者将此作为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性区分：“文明民族的诗歌大部分经过书写和印刷而有了定型，野蛮人的诗歌的保存，却全靠很不确实和不能经久的记忆力”（格罗塞 174）。因为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媒介克服了声音语言转瞬即逝的弱点，能够把文学信息符号长久地精确地保存下来，从此，文学成果的储存不再单纯地依赖人脑的有限记忆，并且突破了文学经典的口头传播在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从而极大地改善和促进了文学经典的传播。而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文学文本有了批量传播的可能。因为文学文本依靠纸草、竹片为载体的传播，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只是随着活字印刷术的产生，文学经典才真正形成了得以广泛传播的条件，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所强调的伦理选择和相应的伦理教诲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书写文本”的理念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石，正是因为书写文本是脑文本的物质载体的体现。既然“只有脑文本才能决定如何进行伦理选择，才能决定人的思想、观念、情感和道德”（81），那么，人们对于文学的美

学定义的反思，就是值得肯定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从不排除文学的审美价值，只是强调它是文学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文学是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所决定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42）。“书写文本”与“脑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是充分说明：没有伦理，就没有审美，没有伦理选择，就没有审美选择。正如聂珍钊教授在文中所言：“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并非贬低审美的作用，而是认为审美不是文学的功能，只是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的方法，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86）。

四

面对媒介化生成的大数据时代，身处彼此跨界和融合的创新发展的信息化时代，文学如何“与时俱进”？作为文学，怎样在自己的“文本世界”搭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所热衷探究的“电子文本”，便是破除文学文本孤独格局，广泛融入现代社会的理想的“突围”。在文学文本的三大形态中，聂珍钊教授所列入的“电子文本”，充分体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具有强烈的科学精神和跨学科意识。

文学伦理学批评对“电子文本”的关注，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在文学研究中正视“电子文本”的出现，弥补了书写文本的不足，优化了文学研究的现状，因为电子文本具有便捷和快速的检索性，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逐渐杜绝了书写文本易于湮灭的倾向。在脑文本、书写文本、电子文本这三种基本的文本形态中，最容易湮灭的是脑文本，因为它会随着脑文本所有者的死亡而消亡；其次是书写文本，它会因遭遇各种流传和储存的障碍而终止流通甚至消亡，在世界文学史上，古希腊诗人萨福的多卷抒情诗集就是因为亚历山大利亚图书馆的焚烧以及中世纪的被禁而基本消亡；但电子文本在储存空间、流传、检索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相对于其他两种文本，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正是由于电子文本具有不易消亡的特性，所以，文学研究中电子文本理念的介入，使得文学研究更为科学、客观，因为电子文本容易检索，不会出现像书写文本那样可能出现的束之高阁、难以发现的倾向。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电子文本还体现在“科学选择”的命题中。科学选择是人类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科学选择是人类文明在经过伦理选择之后正在或即将经历的一个阶段。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自然选择解决了人的形式的问题，从而使人能够从形式上同兽区别开来。伦理选择解决了人的本质问题，从而使人能够从本质上同兽区别开来。科学选择解决科学与人的结合问题”（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1）。当然，在以电子文本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中，更为重要的，是运用先进的科学知识造福于人类。“在接受科学影响或改造的同时，也可以主动地掌握科学和创造科学，让科学为人服务”（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2）。可见，文学伦理学批评具有强烈的精神价值取向，旨在发掘文学文本中除了审美功能之外

的认知功能。当然，文学创作本身就是多元的行为，自从有了“电子文本”，文学创作在具有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可能被少数贪图金钱者所利用，而且也有一定的市场。不过，有人为金钱而创作，有人为理想而创作，有人为思想而创作。为金钱而创作的作品，接受者的根本目的是消遣，我们没有必要在其中挖掘什么思想，也是挖掘不出什么思想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文学研究的科学性，所关注的文学文本，理应是具有认知价值的文学经典。

文学是什么？其实，我们不能用任何单一属性来进行定义。但我们所说的文学，常常包含“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两种概念。前者是“文本”，主要体现的是艺术的内涵，后者是学术，是关于文学的研究，是“文学学”，主要体现是“科学”的内涵。我们文学研究界常常提及的文学，实际上是“文学科学”。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和理论建构”，不仅就文学伦理学作为学科意义上的一些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引领意义的参照，对于完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引发我们思考，是以开放性的胸襟引发我们对文学功能的反思和重新审视，促使我们的文学研究更加逼真地贴近文学的本质特性。

Works Cited

亚里士多德著：《诗学》，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Aristotle. *Poetics*. Trans. Luo Niansheng. Shanghai: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2006.]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Grosse, Ernst. *The Origin of Arts*. Trans. Cai Mohu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和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205-206。

[Nie Zhenzhao.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China Social Sciences* 10 (2020): 71-92+205-206.]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Beijing UP, 2014.]

——：“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2019）：115-121。

[—, “On Brain Text and Language Generation,”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 (2019):115-121.]

Pickering, James H. & Hooper Jeffrey D. eds. *Literatur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1997.

吴笛：《比较视野中的欧美诗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

[Wu Di. *Comparative Studies in Euro-American Poetry*. 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4.]

朱光潜：《诗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页。

[Zhu Guangqian. *The Art of Poetr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